

元 宝 文 史

第
二
輯



元 宝 文 史

第三辑

政协丹东市元宝区委员会文史委员会

序

历时三载,《元宝文史》第三辑终于问世了。

本辑共收编资料 31 篇。这些史料是区政协文史委副主任于秉义根据收集到的现成史料和征集到的素材整理撰写的。史料涉及清末民初直至“九·一八”事变前的安东县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宗教、外交等诸多方面。它的出版,从较系统、较详实地保存史料的角度来说,是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曾经亲历过那段历史的人已是寥若晨星了。通过这些年逾耄耋的人来客观地、全面地记录那些如烟往事,已经很难办到了。《元宝文史》第三辑的出版,也许可以弥补一下缺憾。

由于编撰者自身阅历所限,差错难免。如有舛误还望阅者订正。

政协元宝区四届委员会主席 顾盛文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

《元宝文史》编辑委员会 成 员 名 单

顾 问: 顾盛文
主 编: 宋连夫
副主编: 于秉义
委 员: 万秉义
尹怀书
何嘉新
姜守廷
胡瑞民
晏树彬
徐淑华
梁成然

目 录

1. 安东的早期开发和第一次对外开放	(1)
2. 元宝区地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开发的 ...	(22)
3. 清末民初的安东地方财政收入	(25)
4. 安东的早期对外贸易	(29)
5.“九·一八”事变前的安东总商会.....	(32)
6. 安东早期的金融业	(35)
7.“九·一八”事变前安东的货币流通.....	(38)
8. 二十年代末的安东工商业	(41)
9. 我市早期的中外合资企业之一——屠宰场	(46)
10. 清末的中日合资企业——鸭绿江采木公司	(48)
11. 安东县图书馆初建记实	(54)
12. 安东市立通俗教育演讲所	(57)
13. 安东早期的报刊出版发行	(60)
14. 清末民初的安东教育事业	(62)
15. 安东早期的中等教育	(67)
16. 东边林科高级中学建校始末	(73)

17. 日军强占安东“租界”始末	(77)
18. 中日安奉铁路之争	(80)
19. 中日粮市渡口之争	(82)
20. 安东设治之初的市政建设	(84)
21. 安东早期的行会组织之一——安东艚船公会	(88)
22. 安东早期的邮电业	(92)
23. 二十年代末安东的宗教	(95)
24. 民国年间的安东消防队	(105)
25. “东边道”与东边道尹公署	(108)
26. 安东县的历任县官	(112)
27. 孙巡官禁绝“跳大神”	(120)
28. 陈知县巧计捣赌窟	(124)
29. 因耿直而丢官的道尹——王顺存	(127)
30. 孙培棠和九道沟炼铜厂烟毒事件	(129)
31. 围绕庚戌鼠疫进行的外交斗争 ...	(132)

安东的早期开发和第一次对外开放

在丹东地区的发展史上，曾发生过几次对生产力的大破坏。1621年（明天启元年，后金天命六年），丹东地区为后金所辖，后金采取“定边”政策，将沿江沿海一带居民全部迁往内地，划十字街以东为禁区，禁止农牧、渔猎、采伐、采矿。十余年后的明清战争中，东北地区的汉族农民为躲避战争而大量流入山海关内，清王朝定都北京后，不少满族人也举家内迁，使这里的农业经济日渐荒废。更为严重的是，清朝统治者怕汉族和其他民族破坏他们的“发祥宝地”，以及维护满族和皇室在东北的经济特权，修筑了“柳条边”^①，执行了严厉的封禁政策，把辽河流域定为“龙兴重地”，而东北的大部分地区则变成榛莽之地、边外荒土，丹东地

① 柳条边，又名盛京边墙，柳墙、柳城、条子边。清顺治年间开始分段修筑，康熙中期完成。是一条禁止边内居民越界打猎、采人参、放牧、农耕的柳条篱笆。其修筑办法是用土堆成宽、高各三尺的土堤，堤上每隔五尺插柳条三株，各株间用绳索连结横条柳枝。土堤外侧挖掘深八尺、底宽五尺、口宽八尺的边壕。丹东地区的柳条边属于“老边”，起于现在东港市西部窟窿山海边，北至凤城，经新宾折至开原。柳条边设有“边门”，驻有守门官兵稽察出入，并定期巡逻，查办违禁人员。

区概莫能外。虽然乾隆年间曾因自然灾害而几度弛禁，“准许流民出口就食”，但难民大都是从陆路沿辽西走廊进入东北的，丹东地区仍然人烟稀少。道光二十年（1840年）后，清政府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和巩固边防，进一步放松了对“柳条边”的控制，而丹东地区由于地处偏远，交通不便，而很少为流民注意，仅有少数来自山东的流民在鸭绿江中下游及沿海一带居住，直至同治十三年（1874年）东边地带全部开禁和光绪二年（1876年），这里奏准设县，情况才有了根本性的改变。自那时起，至今不过百二十年，这里竟发生了沧桑巨变，从昔日的荒芜之地一跃而为祖国最大的边境城市，东北的边陲重镇。

特别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安东，曾被国人视为“奉省^①之冠”。究其原因，不仅在于她的地理环境优越，自然资源丰富，也不仅在于她拥有不甘心忍受“命运”的摆布，极富开拓进取精神的齐鲁燕赵移民，还在于她抓住了清

① 奉省，指奉天省。奉天，即今天的沈阳。沈阳，唐为沈州治；元称乐郊；明置沈阳中卫；清称盛京，后改称奉天府，1914年改为沈阳县，1934年设沈阳市。民国时期为奉天省首府。1928年东北“易帜”后，奉天省改为辽宁省。

末、民初政治革新和门户开放浪潮所带来的机遇。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中期，正是清王朝从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的外患内忧的困境中挣扎出来的所谓“同治中兴”时期。列强利用两次鸦片战争敲开了中国东南沿海和长江流域部分省份的大门，为其商品输入和原料掠夺铺平了道路，此时，它们更需要一个和平经营的环境，而清王朝，也急需一个喘息、恢复和发展的机会。正因为如此，才有了“盗贼铲平，中外乂安，官府一体，将相协和”的为期十余年的中外暂时相对和好的形势，也才有了“同治中兴”、“同光新政”，有了洋务运动迅速发展的二十年好光景，有了官僚资本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的迅速发展。在这一时期，中央集权开始松弛，以满州贵族为主体的清王朝逐渐演变为满汉地主阶级的联合政权，统治集团变得较为开明，这就为中原一带的汉人冲破禁锢，大举进入东北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也就是这一时期，清王朝得以休养生息，经济得以复苏发展。而经济发展的需要，则使得东北地区的开发成为可能。官僚资本主义的

迅速发展，使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使得东北地区的丰富的资源有了同先进的生产方式和外来资本相结合的机会。也正是这一时期，大批由关内调到东北驻防的八旗官兵及其眷属成了旗地和庄田的主人，他们迫切需要大量的农业、手工业劳动力，而中原一带频发的自然灾害又一次次地驱使大量流民向关外逃亡。这也是驱使朝廷最终同意开禁的重要原因。丹东地区就是在这种适宜的气候下被非法移民偷偷地开发并最终被朝廷认可，准予开发的。

丹东地区设县于光绪二年（1876年），称安东县。设县前，这里就已经有流民集聚，西南沿海一带已建有庙宇、有了演戏、立会、团练等民间活动。宋三好率领的起义军还在这一带征收“镪钱”、“锄税”，与政府军相对抗。还在设县的前一年，这里的“沙河子”就有了商民的自治组织——“公议会”。设县的当年，县里就确定了本县的货币流通计量单位——“镇平银”^①

^① 平，旧指一种衡量的标准。如“库平”、“漕平”等。镇平银，指安东县自定的征收租税，出纳银两的货币单位，全称“镇口锦实银”，每锭53两5钱，由安东县的银炉用各地的杂色银子铸成，是当时安东县大宗工商交易中的唯一货币。

并设立了“沙河山货税局”，这些都说明，此时的安东，商品交易活动已较活跃。光绪二年，河北、山东、山西一带大灾，光绪三年，河北、山东再次遭灾，流民大批涌入关东。其中由海路而来的，大都奔向辽南、辽东。他们当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循“沙河子”之名而来的。他们带来了中原的农耕、手工业技艺，到这里开荒种地、伐木、狩猎、开办手工业作坊，给刚刚设县的安东地区增添了生机和活力。山东、山西等地一些商人也相继到此寻找新的发展机会。1879年，山西人开办的民间银行“三晋源票庄”在这里开张，1882年，清政府允许安东与朝鲜义州两地进行贸易。1883年，设立了“中江台税务”，以管理两国边贸。航运业的行会组织——“鸭绿江艚船会”也应运而生。1897年，设立了电报分局，建立了开采黄金的“东边矿务局”，等等。此时的安东已经确立起了东北地区重要物资集散地的形象，并为对外开放打下了初步的基础。

令人遗憾的是，安东设县之时，正值西方列强争夺殖民地的又一个高潮的开始。刚刚登基的小皇帝光绪面对着内外交困的局面。同治

十三年(1874年),日军侵略台湾。刚刚从内战中脱身的美国,此时不甘心只得到英、法、俄等国的残羹剩粥,扮演了趁火打劫的角色,成为侵台日军的帮凶。光绪元年(1875年),英国制造了马嘉理事件,夺取了对云南的控制权,沙俄在西北不断蚕食新疆。光绪九年(1884年),法国加速了对西南和东南沿海的侵犯,安东也未能幸免。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日本军队侵犯我领海领土的首战就先后发生在大东沟海面和安平河口——虎山——九连城一线。“中外义安”,已成玉碎。国内则灾害连连,饥民遍野。光绪自叹“边防不靖,疆臣因循,国用空虚,海防粉饰”,“对不起祖宗”。值得欣慰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光绪已逐渐成熟,走向觉醒,并最终迈出了对外抵御外侵,对内革新变法的步子。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促成了他维新变法的决断。他在革新派人士的支持下,对中华的自强做了规划,并把这一规划明确地传达给各级官吏。他说:“自来求治之道,必当因时制宜……,如修筑铁路,铸钱币、造机器、开矿产、折南漕、减兵额、创邮政、练陆军、整海军、立学堂,大抵以筹

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皆应及时举办。着各直省将军、督抚、将以上诸条，各就本省情形，与藩臬两司暨各地方官悉心筹划，酌度办法，限文到一月内分晰，复奏”。他指令各地官员筹资经商办厂，要求他们“宣布朝廷意旨……，可以投股官商合办，或另集股本，择地造厂，或纳资充认旧有局、厂”。换成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既可以公私合营，也可以合资创办企业，还可以将现有企业卖给私人经营。并明确指出：朝廷的招商政策是“仿照西例，商总其事，官为保护”，公开宣布了对资本主义经济采取务实、保护、促进的政策。在变法的短短的 103 天里，他迅雷般地推出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位的改革项目，发布诏令谕旨近 200 条，他下令裁撤闲置官员，鼓励各省商办铁路、矿务，广设邮政分局，废除八股科考，广办新式学堂，要求全国各地的大小书院和民间祠庙一律改为兼及中西文化的学校，选派学生出国留学，办译书局，设报馆等等。光绪帝这种卧薪尝胆，痛雪国耻的决心震动了朝廷、影响了全国。尽管变法失败了，但它的影响已经深入人心，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它为丹东地区

的开埠通商奠定了思想基础。

对于全国来说，形势是比较明朗了，而对东北地区来说，形势则要复杂得多。作为争夺殖民地的重点目标，它成了列强觊觎的焦点，捷足先登的是日本。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它通过甲午战争后的《马关条约》强占了辽东半岛。俄、德、法三国出于各自利益的考虑“干涉还辽”后，俄国人又趁乱强占了旅顺口和大连湾，取得了修筑中东路支线到旅大的特权，从而实现了沙皇在东北亚地区夺取一个天然不冻军港和直面太平洋的出海口的梦想。它进而把整个东北当成自己的势力范围。接着，又借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之机武力占据了东北。它在疯狂掠夺鸭绿江朝鲜一岸的森林资源的同时，偷偷派人员勘察了中国一侧的森林资源，而后又派出了成建制的“狩猎队”，强占了凤凰城、沙河子（安东县城）。“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列强通过《辛丑条约》得到了各自的利益后，便共同促使俄国依照条约的条款从东北撤兵，以便共同享有这块肥肉，但沙俄实在不甘心这样做。正如俄国驻东京公使罗申男爵所说的，“在对待我们的态度这一点上，英、美、日等大国所

持的态度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因为我们曾经承认，门户开放原则是我们在中国的基础之一，并承认满洲是中华帝国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已经开放的营口和由我们开放的大连并不能使它们感到满足。它们还要求开放奉天、哈尔滨、鸭绿江口。这些地方不仅要成为外国贸易的中心而且要成为外国司法管辖的中心。置于国际条约保护下的这些地点，一旦为某一个大国所有，就必然会损害其它一切同中国缔约的大国根据条约享有的权利……，那就会给我们吞并满洲的愿望设下实实在在的障碍……。英国和日本本身没有采取这一步骤，而是躲在美国背后，撺掇它采取行动……。美国已向中国提出在满洲开放新地点的要求，这些新地点是：大孤山、鸭绿江口、奉天和哈尔滨”。很显然，此时的安东在列强眼里不过是一块已经摆上餐桌，等待分享的蛋糕。

事实正是这样。此时的鸭绿江口（丹东），因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和经济地位已经成为东北地区重要物资集散地和出海口，成为联系俄罗斯、朝鲜和日本的重要交通枢纽，成为潜在的、俄国控制朝鲜，威胁日本，日本攫取东三

省、蒙古、兵临西伯利亚的桥头堡和兵站基地，其战略地位日渐显露。在这种形势下，对美、英来说，既要取得东三省的利益，又要避免与沙俄、日本兵戎相见，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利用“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的外交原则，在俄、日两国各自的势力范围内打进楔子，取得立足点和经济利益。安东，便是可供它们选择的最佳地点之一。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列强对东北的侵略，是安东对外开放的直接原因。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8月，美国与清政府签订了《中美续议通商行船条约》，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安东县由中国人自行开埠通商，允许外国人在安东居住、贸易。10月，日本也与清政府签订了《通商行船续约》，议定把大东沟开为商埠。这表明，安东已经开始了法律意义上的对西方的开放，然而，屡遭列强战火洗劫，对西方人心存芥蒂的安东县当局并未立即采取开埠行动。列强的忍耐是有限的，尤其是日本，因为它想从东北得到的远不止“开埠通商”。1904年，日本人迫不及待地挑起了与沙俄争夺东北的“日俄战争”。俄军战败后，日、俄重新瓜分了东北，清政府被迫承认了日本在东北的特权，允许日本

在沈阳、营口、安东划定“租界”，允许日本在鸭绿江中国一岸设置木植公司等等。日本人凭借武力在安东县城划定“租界”后，打着“购买”的幌子，以极低的价格霸占了六、七道沟一带中国人的 320 万坪，约为 10.7 平方公里的土地。它在这里设立了“军政署”、“兵站部”，“市政准备委员会”和“市民公议会”，规划了市街、修筑了防洪堤坝、道路，建造了住宅，建起了军用制材厂、造锯厂、制米厂、修筑了安东至凤城的军用铁道和江岸火车站等等。美国人不甘人后，照会清政府外务部，要求速开奉天、安东、大连三处商埠。1905 年，日本人的安奉军用轻便铁路建成。1906 年 4 月，日本设立了驻安东领事馆，同年成立了“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和“关东州（辽东半岛）都督府”。前者本部设在东京，分社设在大连，是假借公司之名，行机关之实的“文装武备”的殖民机构。后者则直接负责控制辽东半岛。安奉军用铁路也改为商用。这一切令美、英等国坐卧不宁，心急如焚。1906 年 5 月，在重重压力下，东边道候补道员钱鏗与日本驻安东领事冈部三郎就安东开埠通商一事举行第二次谈判。不久，中日合资的屠宰场，鸭